

江蘇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八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我的片断回忆·····	廖运泽 (1)
我所知道的龙潭战役·····	周维纲 (48)
1927年龙潭战役亲历记·····	黄 政 (56)
齐卢之战松江、青浦战区暴行录·····	涂开典 (63)
抗日战争时期韩国钧先生简谱·· 范崇山 程奎中整理 (70)	
近代中国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事略·····	丁浩霖 (85)
邮政人事管理制度二十五年见闻·····	过秉堃 (91)
我的自述·····	陆澄溪 (124)
江苏境内的木材市场·····	胡子丹 (152)
通海地区关庄布兴衰史略·····	陈曾毓 (157)
东台县北三场和东何两场农民 反抗征收垦务捐的斗争·····	朱明熙 卞小芝 (167)
我在江阴励实学堂·····	胡山源 (174)
南京孤儿院创建始末·····	王芷湘 (193)

读者·作者·编者

对第十五辑《我所知道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

一文的补正…………… 赵毓麟（207）

我的片断回忆

廖运泽

一、坎坷的少年时期

童年的启蒙

我于1903年7月出生在安徽寿县廖家湾村。父亲廖子宾，年轻时曾参加过清王朝的淮上军，从士兵递升至副团长，是同盟会会员。母亲谢氏，生我和妹妹两人。

1908年（清光绪末年），我父亲和我的远房伯父廖盘楨等人参加熊成基领导的新军起义失败后，熊成基逃到廖家湾，躲避在我家一间曾经喂过牛的屋子里。那时我才五、六岁，父亲叫我每天偷偷地给他送饭送水。记得有一天我去送早饭时，看到他的假辫子还摆在桌子上。因为那时的革命党人率先剪了辫子，为了掩人耳目，白天就得戴上假辫。熊在我们家躲了六、七天以后，因为怕走漏风声，就先后逃往东三省和日本去了。熊成基原在安庆新军炮营当队官，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刚一死，他就在安庆发动新军起义反清，人们都说他是“徐锡麟复生”。可惜从日本回到哈尔滨后就被清政府杀害，时年仅二十四岁。

1911年辛亥革命时，我刚在村里念私塾。武昌首义成功后，

各省先后宣布独立，安徽省是先从寿县发难的。我父亲也参加了淮上军9月15日（农历）攻打寿州府的武装起义。听说当天晚上起义的团队还没有进城，就把知府和总兵都吓跑了。第二天继续打下了颍上县，到9月21日，在安庆宣布安徽独立。后来我的远房叔父廖朴纯在堵截张勋的辫子兵时，在蚌埠小南山不幸牺牲。消息传到村里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引起了一种朦胧的哀伤。

辛亥革命成功后，我父亲因功递升为第七旅十三团副团长。为时不久，因部队被北洋军阀倪嗣冲的军队打垮，逃亡上海避难后就解甲归田了。

这些童年的往事，至今犹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是对我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种启蒙。

蹉跎岁月

我们廖家的祖辈在村里原来是个大户，后来逐渐衰落。我父亲离开新军回乡后，两袖清风。家里虽有二十六亩土地，但自己不会耕种，只好租给别人。每年收租不够吃，还得做点小买卖，才能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先是推豆腐，后来又磨面粉卖。其实，推豆腐、磨面粉都挣不到多少钱，主要是为了赚点豆渣和麦麸来糊口度日。

十六岁高小毕业时，由于家境日益贫困，我被迫辍学在家帮助父母劳动，常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赶着瞎了一只眼的驴子在磨房里推磨。白天不是到野外放驴子就是到镇上去赶集，有时还要挑着几十斤重的担子到离家三十里的寿县城里去卖面粉。

另外，我还要替军阀队伍出“官差”。离我们村两里半的连家岗村北边有一座营房，驻着倪嗣冲部队的一个连，大约有步兵七、八十人，骑兵二、三十人。因为我们廖家湾村里参加过同盟

会的人比别村多，他们就经常到村里来抓革命党人。我常常被强迫替他们遛马，遛不好就得挨打受骂，但“敢怒不敢言”，只得老老实实为“丘八”们无偿劳动。

到安庆半工半读

1920年春，父亲听说当时的省会安庆办了所职工学校，上学不要钱。看我这样在家混一辈子也不是办法，要我去闯闯看。这也正合我的心意。我就辞别父母，背井离乡，只身到安庆去。临走时，父亲七拼八凑，好不容易才凑了四块银元给我作路费。那时，从蚌埠到南京的火车票要三块钱，从南京到安庆的轮船统舱票要两块多钱。一路省吃俭用，到了南京，口袋里的钱已不够买船票；只好“破釜沉舟”，把随身携带的一床棉被在下关车站街头卖掉才上了船。

有志者事竟成。到达举目无亲的安庆以后，我终于如愿以偿，考进了安庆职工学校。这个学校是专门为家境贫寒、无力升学的有志青年开办的。校长王先祥先生是安庆人，大学毕业生。他每天除了繁重的校务工作之外，还亲自给我们上语文课。他学识渊博，讲课很有吸引力。在二十年代初的旧中国，有这样热心职业教育的有识之士，实在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佩！1949年我任第八绥靖区副司令经过芜湖时，听说他还健在。

学校的制度是上半天劳动、下半天上课。学生住校，不缴学、杂费和宿、膳费。文化课和普通初中差不多。劳动生产分木器、油漆、藤器、皮革等四个科。我分在皮革科，学会了做皮鞋。所以，后来在黄埔一期时，同队中有的同学知道我有这门手艺，每逢星期天放假外出，怕皮鞋擦不亮被罚“禁足”，就常常

找我帮他们擦。

1919年在北京天安门前兴起的“五四”运动的风暴，后来也波及到了安庆。这就使得职工学校的学生不仅能刻苦攻读，而且也关心时政，积极参与全市的学生运动。历尽坎坷、饱尝失学痛苦的我，无形中就成了学校里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不料，由于参加学生运动，使我没有等到毕业就踏上了新的征程。

二、投奔黄埔军校

逼上“梁山”

我在安庆职工学校读书时，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旧中国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也是孙中山先生经历了辛亥革命、反袁、护法失败，在广州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准备改组中国国民党，建立党军，完成北伐大革命的时候。我之所以能够投奔黄埔军校，可以说是北洋军阀把我逼上“梁山”的。

1923年10月初，曹锟以五千元一张选票贿选当上了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全国舆论大哗，安庆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倒曹”运动。10月中旬的一天，安徽大学、安庆一中、安庆职工学校和安庆女子职工学校的学生扛着校旗，在黄家操场集会。柯庆施当时是安徽《建设日报》的记者、安庆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揭露曹锟贿选的丑剧，当他讲到“在我们安庆就有两名参与贿选的猪仔议员”时，会上群情激愤。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顺便抄了参议员何雯和张伯炎两人的家。安徽督军倪嗣冲急忙下令从芜湖抽调北洋军阀部队的一个团到安庆来镇压学生运动。柯庆施获悉倪嗣冲下令通缉的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后，急忙通

知我，要我赶快逃走。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四顾茫然地问他：

“我往哪里逃？”他说：“你到广东投奔孙中山，上黄埔军校去！”我听了之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好！”就在这一瞬间，我作出了关系自己一生道路和命运的决定，带着柯庆施给我的报考军校介绍信和十五块银元的路费，连夜乘轮船逃出虎口。大约在12月底到上海找到了广东方面驻上海的办事处，经初试及格，又领到三十块银元的路费，遂和安徽同乡许继慎、曹渊三个人一同从上海秘密乘轮船去广州。

当时，黄埔军校只在广州公开招生，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原和北方各省都是秘密招生。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曾下令缉拿去广东的爱国青年，只要抓到就枪毙。因此，船上虽有不少去黄埔的同伴，但彼此都“心照不宣”，不敢打招呼。后来，据同队王之宇同学说，他和侯镜如两人是在河南留美预备学校上学时，由国民党地下党员、国文老师魏松声的秘密介绍南下投奔黄埔的，他们怕沿途军警检查，曾把魏老师写在白绫子上的介绍信缝在棉袄里。就这样在船上提心吊胆地熬了五天五夜，经过厦门、香港，终于到达广州。

到广州后，看到一些醒目的革命标语，使人感到广州确实有一种“革命策源地”的气氛，与军阀统治地区的景象完全是两个天地。后来在广东师范学校内进行复试，监考的都是孙中山先生警卫队的卫士。不久看到榜上有名，几个人真是欣喜若狂。遂于1924年5月5日到了四面环水、风景秀丽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报到。我被编到第三队，与陈赓、阎揆要、杜聿明、李仙洲、侯镜如、王之宇等人同队，和陈赓、阎揆要等人同住一屋。每人发给两套军装、衬衣裤、两双布袜、草鞋，把原来穿的便服换下来，从此开始了崭新的军校学生生活。

难忘的训诲

早在念小学时候，我就读过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故事。刚到广州住在旅馆里等待出榜时，闲着没事，曾去广东大学听了好几次孙先生演讲“三民主义”，觉得很有道理，耳目为之一新。然而使我终生难忘的还是孙中山先生在6月16日开学典礼上的那次演讲。参加典礼的除全体教职员工外，还有在广州的地方军阀部队的总司令，如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粤军许崇智、豫军樊钟秀等人，他们都身穿礼服，腰挂指挥刀，每人带了好几个马弁，相当威风。当孙先生讲到办军官学校的宗旨和为什么要创建党军时，忽然双目炯炯地用手指着那四个司令说：“他们都是来和我合伙做生意的。人家做生意是赚了钱要分，他们是不赚钱也要分……。”我当时听了，心里暗暗惊奇：为什么孙先生能当着军阀的面这样讲？后来才知道孙先生这时已经开始认识到：过去那种不依靠真正的革命武装力量，单靠利用一个军阀打另一个军阀的办法已行不通了。这些人表面上拥护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实际上是“同床异梦”，靠不住。他讲话中这段插曲，在以后正式印发的文献中是没有的。这正是他为什么要创办黄埔军校的最好注脚，使我终身难忘。

亲密无间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缩影。在教职员和学生中既有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人，还有两党交叉的党员。在国民党人中不仅有左派，而且还有中间派和右

派。比如，在教职员中，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训练部主任李济深，副主任邓演达，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总教官何应钦，战术教官刘峙、顾祝同、钱大钧、陈继承、严重，政治部主任先是戴季陶，后来是周恩来，政治教官恽代英、肖楚女、陈潭秋等等，这都是人所共知的。

在这样一个兼容并蓄，包罗了各方面人才的革命军事学校里，虽然存在着由中共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由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之间的分歧，但开始只限于学术是非、理想、信仰领域内的自由争论，尚未发展成为象后来那样国共两党之间的政治斗争。据我所知，国共发生实质性的分歧是在四期以后的事。一、二期时，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双方相处是亲密无间的。不仅邓演达等人和周恩来相处非常之好，就是校长蒋介石和周恩来主任之间，由于蒋当时在政治上是以左的面目出现，故两人政见一致，相处得也很融洽。同学中的国共两党党员信仰自由，谁也不嫌弃谁。周恩来主任晚上经常找同学个别谈话，不论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都一样找了谈。我当时还是国民党员，也应邀去过两次，他的亲切感人的谈话，使我如坐春风。因为那个时候，在孙先生“三大政策”路线的指引下，彼此有着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学校里当时那种局面，可说是国共合作的黄金时代。至今思之，仍使我不胜依依。

在革命摇篮里

黄埔军校当时号称“革命摇篮”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期的五百多学生和以后各期陆续培养出来的数千人，都成了东征、北伐时党军中的骨干，不少人后来都成了国共双方的高级将领。其实

黄埔一期从1924年5月5日入学到11月底毕业，受训时间不过七个月，它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我的体会主要有两条：

一是由于它采取了苏联红军中一套成功的政治工作体制和政治工作方法，使它和过去所有的旧式军事学校区别开来。诸如在学校设置党代表和政治部，在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四大教程”和“典、范、令”之外，增添了大量的政治课程如三民主义、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华史、世界革命运动史等。在学校里，《响导》杂志和其它政治书籍、马列主义书刊，学生都可以随便看，政治空气既浓厚又自由。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有一次对我们讲校训“亲爱精诚”四个字，讲了四个钟头。此人很有学问，也会讲，可惜多是些孔孟之道，不如后来的周恩来主任的讲话那样受人欢迎。我至今还记得每逢周恩来演讲，大讲堂里总是挤得满满的。

二是在军事训练方面，虽然也是由苏联顾问亲自指导，按照苏联红军的教材和教法，但基本上是沿袭了日本士官学校那一套极其严格的训练方法。二十世纪初叶，世界上以日本和德国的陆军为最好，早在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时，就聘请了日本教官，后来的保定军校和各地讲武堂也都是师承日本的练兵模式。黄埔一期的军事教官和队职干部，基本上都是日本士官、保定军校出身。分队长这一级的干部，全部都是云南讲武堂的。我的分队长肖乾就是云南讲武堂毕业的，此人少年英俊，不论是制式教练还是野外演习的示范，动作都非常标准。教练部主任名义上是李济深，实际上训练工作是总队长邓演达负责。邓演达是保定六期毕业，不仅在政治上是真正的国民党左派，而且在军事学术上也是才华横溢。他着装整洁，注重军人仪表；举止动作，一丝不苟；经常穿一双长统马靴，走起路来很有精神，每天起床号音一落，

就听见他的脚步声。他对学生的训练要求十分严格。早上一起床，就忙着打裹腿、洗脸，上厕所都得用小跑步，出操、集合、吃饭都要快。广州天气多雨，一天“三操两讲堂”下来，夜晚还要摸黑擦枪，熄灯就寝时腿痛得上不了床。操场上动作太差的，还要“下小操”。我们三队的排头韩之万，是苏北人，几乎天天都在下小操。刚入伍的头一个月，我和一部分同学，对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确实有些吃不消，不少人在背后叫苦。邓演达总队长为此向我们训了一次话。他说：“入军校是来革命，不是来做官当老爷的。你们看看，现在东、西、北三江，哪一江不在炮声隆隆之下。你们如果认为苦，受不了，趁早另作打算；否则，勉强毕业出来也不管用。”这番话的分量很重，大家听了以后，再也没有人叫苦了。

由于军校教育的这两个特点，终于在短时期内把我们从一个普通青年学生锻炼成为既有革命热情又能够带兵打仗的青年军官。

三、东征到潮州

第一次东征

1925年1月第一次东征军出发前，我刚由黄埔一期毕业。我和袁守谦、邓文仪三人同时分配到第二期学生总队部当教育副官，总队长是严重。我和袁守谦相处较好，他喜欢喝酒，经常晚上打酒来请我们喝。东征军是以黄埔一期学生为骨干编成的两个教导团为主力（教一团团长何应钦，教二团团长王柏龄），另有粤军第二师等部队参加。并以黄埔二期学生总队的第五队、第七

队、炮兵队、工兵队、辎重兵队，担任总指挥部的卫队。出发时，严重他调，总队长由胡树森继任（胡是保定军校毕业的）。第一次东征军的总指挥是许崇智，参谋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实际上许崇智并没有去，整个战役都是蒋、周两人共同指挥的。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也参与运筹。在东江农民的配合下，于3月底克复潮州、汕头。

东征途中，我因负责总部的警卫工作，与蒋、周接触的机会较多，亲眼看到他们两人合作共事的情况。我当时的印象是：蒋介石受日本士官教育的熏陶，指挥沉着坚定，善于临机独断；周恩来虽是文人出身，初出茅庐，年方二十六、七岁，但在行军作战中已显露出他非凡的指挥才能，从淡水和棉湖两次战斗中可见一斑。

2月12日进攻淡水时，守敌是陈炯明部号称勇敢善战的洪兆麟师。蒋介石校长曾亲自到炮兵阵地上督战。当我军刚刚攻占淡水时，指挥所设在南门里一所小学校内。下午四时许，官兵正在开饭，突然发现敌军从城东一个高地上向我猛烈射击。二期学生初次临战，表现有些慌乱。蒋介石校长以受敌瞰制，态势不利，立即带领部分卫队把指挥所转移到城外一座小庙去。我为了保护首长安全，几次劝说周恩来主任赶快出城，周始终坚持不走，非常镇定地站在院子里观察敌情，指挥卫队作好战斗准备。直到后来情况逐渐稳定，全部卫队撤至指定地点后，才从容转移到新指挥所与蒋介石会合，至傍晚始将敌军击败。

这次战斗中，教导第二团团长王柏龄因没有掌握好队伍，贻误戎机，当天晚上就被撤职，遗缺由钱大钧继任。王在黄埔一期任教授部主任时，上战术课，讲得头头是道，深得同学好评，可惜缺乏指挥作战能力，因而人们常常笑他“炮声一响，战

术忘光”。

在3月12日棉湖战斗中，双方血战两天三夜。战斗至最后阶段，教导第一团在棉湖西北山地遭到林虎部主力三个师的围攻，从拂晓战斗到下午四时左右，教导第一团以千余兵力抗敌两万之众，伤亡惨重，团长何应钦亲率警卫排坚守阵地，几乎不支。周恩来主任感到情况十分危急，抽调部队已来不及了，便自告奋勇，向蒋建议由他率领卫队即刻前往增援。蒋主张等进一步弄清情况后再说。周以当前关键在于不让敌人完成合围，那怕是以很小的部队击敌侧背也能给敌以极大的威胁，得到了蒋的同意，当即带领总部卫队中的三个中队驰往增援，并命我随行。不久，蒋抽调钱大钧的教导第二团也及时赶到，并力粉碎了敌军的攻势，乘胜翻越猴子岭，追击溃逃之敌，相继攻克林虎的后勤基地五华及其司令部所在地的兴宁。

棉湖之战使学生军声威大振。因为当时学生军都戴着象西装领带似的红领带，后来敌军官兵只要看到带红领带的就望风溃逃。所以在继续进军中，兵不血刃就克复了梅县和潮汕。

在潮州分校

第一次东征结束后，军校在潮州创办了潮州分校。我被派到分校当学生第一队队长。开办不久，学校因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刘、杨叛乱而暂时停办。我旋即被派潜往中原地区侦察北方军情。在河南夏邑碰到安徽同乡、一期同学徐石林，两人都穿着便衣，一块调查了国民第二军岳维峻部的兵力、编制装备、训练及士气等情况。返回广州时，第二次东征军已胜利收复东江各地。我于1926年1月到了潮州，正赶上潮州分校正式复课，我仍回分校，

改任学员第三队队长。

潮州分校校长由何应钦兼任。教育长王绳祖是何应钦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政治部主任何玉书，王昆仑、王逸常和徐石林等人当时也在那里当政治教官。大队长阮开基是江苏扬州人，保定军校六期毕业。学员队是由收编粤军部队保送来的下级军官，于1926年6月初毕业，列为本校三期。学生队是在东江一带招考的青年学生，于1926年底毕业，列为本校四期。在学生中，我记得王耀武是学员队的，王岳是学生队的，后来曾任国民党第十军少将副军长。还有一个学生叫竺鸣涛，是蒋介石的亲戚，后来当了浙江省保安处处长，1947年我在南京赋闲时，他曾邀我去杭州游览，我没有去。此人1949年去了台湾。

在潮州分校有值得回忆的两件事。

一是我于1926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黄埔一期上学时，我在学校里集体加入过中国国民党。到潮州分校后，在左右两派日益分化的情况下，经一期同学、安徽同乡孙一中、曹渊两人介绍，我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孙、曹两人当时都在教导团当连长。黄杰在那里当营长。

二是组织师生听周恩来的临别讲话。我刚到潮州分校不久，周恩来主任就调离黄埔军校。他由广州经汕头去上海，经过潮州，想对分校师生讲一次话。此时黄埔军校师生中左右派斗争渐趋激化的情况已波及到分校，他惟恐右派学生捣乱，事前通知我作些准备，并问我有无实际困难。我分析当时分校的形势，虽然右派势力较大，但大多数师生对周恩来十分敬重，只要做好思想酝酿和保卫工作，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当即向周表示一定能完成组织师生听讲的任务。我随即找了一些共产党员和比较进步的学生作了动员和布置。结果，由于他的讲话语重心长，言简意赅，

以及他在军校工作中所树立的威望，在讲话时，全场鸦雀无声，出乎意料的安静，中间有几段精彩的讲话曾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四、北伐在武汉

到武汉分校

1927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誓师北伐时，我正在潮州分校任教。北伐军胜利进抵武汉以北长江沿线时，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在南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何应钦率第一军由东江出师打到福州，赶走了福建督军周荫人。1926年10月，潮州分校停办，何应钦一连来了六次电报，要我把分校毕业学员生带到福州去。与此同时，我接到叶挺部队的孙一中、许继慎等同学从武汉来信，约我到他们那里去，并得知周恩来、邓演达、宋庆龄等人都在那里，形成了与南昌相对峙的左派政府，使我对武汉方面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十分向往，因此，我决心去武汉不去福州。乃于1927年1月离开潮州经广州去武汉。同行的还有二队队长余锦源（后来当了七十二军军长）、第三区队长杨德亮（后来在胡宗南部当军长兼酒泉警备司令）等人。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到达武昌后谒见邓演达，邓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因军校武汉分校刚刚成立亟需充实干部，他就派我到分校政治大队第四队当队长，徐向前当时在第一队当队长。

武汉分校校址设在武昌两湖书院旧址，校本部在南湖之滨。政治大队和两个女生队都住在西斋，第五期和炮兵、工兵队都住在外面。分校校长原是蒋介石兼。3月下旬，学校更名为中央军事